

數位匯流時代的媒介批判實踐： 從 Scott Lash 的資訊批判如何可能談起

Media Critique and Practice in an Age of
Digital Convergence:
How Is Scott Lash's *Critique of Information* Possible?

許文宜

Wen-Yi Hsu

世新大學傳播研究所博士生

Ph D. Student, Graduate Institute of Communication,
Shih-Hsin University

【摘要 Abstract】

面對媒體、電腦及電信傳播匯流的時代，英國社會學者 Scott Lash 的資訊批判以「跨學門」對話，觀察到傳播「視角」較陌生的部分，論證「成長於意識型態世紀的批判理論早已行不通」，全球資訊文化從過去的「再現文化」逐漸轉換成一種「技術文化」，而「技術客體」本質的「自反性」，使得傳播科技本身的「成就」，很可能正是造成媒介社會失序「不預期結果」的原因之一，因此，媒介批判必須從傳統對「再現」文本注意力的認識論移轉到「技術現象學」，因為，不再有「先驗」的理論，或「完美」的外在判斷標準，批判透過「震撼經驗」而來，媒介批判與批判者扮演的只是「填補」的角色，以一種「附加」、「補充」、「操作」的過程，使傳播社會藉此得以修復，或更趨「完整性」。

批判理論是否真的「行不通」，Lash 的論點還有待檢驗，但其「內在於資訊本身之中」的「資訊批判」，確有可能，只是，衡量

其理論與方法上的思考及解決，是否有助傳播領域學門知識在數位匯流時代中向前推進，顯然，**資訊批判**還不能算是「完成品」，至少還需累積更具體的經驗性研究，一個基進傳播現象學的「媒介理論」才得以「填補」完成。

In an age of digital convergence, Scott Lash recommends some points beyond traditional perspectives of communication by interdisciplinary theorizing. Lash's argument in *Critique of Information* is that the earlier critical theory is no longer possible. In the global information order, what happens is a shift from a culture of representation to a technological culture.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 of communication itself, as say the reflexivity of technological objects, causes th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We should be moving from representational culture of epistemology to technological phenomenology. The critique of information takes place through shock-experience, and critique itself and the critic can only be the supplement. The critique of information lies in the power of the “and” because there is no more transcendental or perfect theory outside.

Is an older generation critical theory no longer possible? Lash's argument should be reexamined. However, it is possible that informationcritique must be inside of information. In addition,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Lash has to accumulate more empirical research to complete his so-call “mediatheory”. It then really helps the knowledge of communication fields moving forward.

[關鍵字 Keyword]

數位匯流；資訊批判；先驗；自反性；技術的現象學

Digital Convergence; Informationcritique; Transcendental; Reflexivity; Technological Phenomenology

壹、緣起

Kant問：「知識如何可能」？Durkheim問：「社會如何可能」？倫敦大學社會學教授Scott Lash，2002年出版**資訊批判**（*Critique of information*）一書，問的則是：在資訊世紀中，「批判理論如何可能」？然而，

當Lash論證指出，成長於「意識型態」世紀的批判性社會科學「行不通」時，他留下的問題和質疑，其實比提供的答案還要多。

這本書出版至今近四年，卻仍有不少人「琢磨」其中，除了Lash「非線性」的寫作風格，需費神理解外，他集結I. Kant、E. Durkheim、E. Husserl、M. Heidegger、J. Derrida、E. Levinas、J. Lacan、B. Latour、Peirce、A. Schutz、Gadamer、H. Lefevre、H. Garfinkel、J. Huizinga、P. Virilio、W. Benjamin、G. Bataille、G. Deleuze、F. Guattari、N. Luhmann、P. Bourdieu、M. Foucault、J. Habermas、R. Koolhaas，乃至M. McLuhan、D. Haraway等人論述學說於一書，「閱讀門檻」頗高，也是因素之一。

事實上，批判理論是否真的「行不通」，Lash的論點還有待檢驗，然而，只是他試圖在游移且紊亂的資訊秩序（information order）中，建構「資訊批判」（informationcritique），在傳播科技數位匯流的今天，毋寧是更值得追問的議題。也就是說，不論批判理論過去用以批判資本化社會以及工業生產型態科技理性所倚恃的「資本、生產、意識形態、科層組織、文本、權力、論述、敘事」等，是否真的都不管用了，但Lash既然提出，摒棄「反思」態度，「內在於」（immanent to）資訊秩序（information order）、「補充」（supplement）、「附加性」（additivity）的「資訊批判」理論，那麼，他所謂的「資訊批判」究竟所指為何？又如何可能？實有探討的必要。

表面上，**資訊批判**一書，似乎強調的是「資訊」，然而，Lash（2002, p. 204）指出，是「傳播」讓資訊得以在「全球」擴張，……「傳播」賦予資訊動態、力量，是能量的來源，……是當代社會生活的基礎、資訊與全球之間的連結，就這個意義而言，或許「傳播」才應該是我們分析的基本單位，而非「資訊」。另一方面，社會結構衰退，被「流動」的結構所取代；……古老的產製社會的結構及其再現文化，如今不僅被資訊結構所取代，也逐漸被傳播結構取代（Lash, 2002, p. 176），……在全球資訊秩序中，社會關係正轉型為傳播關係（Lash, 2002, p. 206）。因此，對照Lash所說，大眾媒介存在已久，但唯有在與媒體、電腦以及電信傳播匯流時，「媒介時代」才得以建立（Lash, 2002, p. 66），顯然，Lash所討論的對象及範圍，不是單指某一種資訊或僅限於電子媒體，而是一個廣義的媒介社會，涵括當前傳播科技數位匯流下整體的媒介環境。

唐士哲（2003）曾經評論指出，Lash這本書值得推薦之處，是其對於傳播研究新議題的開發，有提示的作用，相對於向來只處理傳播內容

意涵、或傳播通路的理論傳統，無疑是一條值得再探索的新路徑。因此，面對電信、網路及廣電媒介匯流的「媒介時代」，與Lash「對話」，未嘗不是前瞻思考媒介批判實踐一個「另類」的「起點」。

貳、資訊批判

批判總是涉及從一個先驗的（transcendental）、分離的空間，展開批判反思，但我這本書的論點正是：如此的批判不再可能。對我而言，全球資訊秩序本身已經消除同時吞沒自身的「先驗性」，不再有任何外在的空間可以提供如此的批判反思，也沒有充足的時間。我們不可能逃脫資訊秩序之外，因此，資訊批判必須來自資訊內在本身（Lash, 2002, p. vii）。

這是**資訊批判**全書中最關鍵的論點，也是結論之一。然而在檢視Lash所謂資訊批判必須回到資訊的「內在」（immanent）本身，是否確實有助於思考數位匯流時代的媒介批判之前，首先必須將其略顯「跳躍式」的論述，一一連結回理論的根源加以解讀，才得以判斷「如何可能」的問題。而由於Lash的**資訊批判**仍不脫其長久以來對「秩序」，尤其是「失序」問題的關注，因此，在檢視理論脈絡的邏輯之前，有必要先描繪Lash所提出的「資訊權力新秩序」與「全球資訊新秩序」的輪廓，因為，凸顯「媒介地景」的過程中，Lash許多主要的概念與論述也將逐一浮現。

一、資訊權力新秩序

由於批判理論無論是否具「先驗性」都涉及「權力」的理論，因此，Lash這本書的目標之一，就在於探索逐漸浮現「資訊政權」（informational regime）的權力輪廓。

（一）「排除」（exclusion）原則

Lash的結論是，資訊秩序的運作力量是「排除」（exclusion），完全不同於傳統製造社會的「剝削」（exploitation），如果在意識型態批判中的權力關係，奠基於真實財產，那麼，資訊批判的權力基礎則在於智慧財產權，以設計密集的物质性與資訊性產品的變化來定義，權力變成了關於智慧財產（專利、商標與著作權）的問題（Lury, 1993; Luke, 1995; Lash, 2002, p. 75）。

(二)「非線性」、「非論述」權力結構

Lash強調，無論德國或法國批判理論¹，都將權力視為「線性」的，發展出一種「線性批判」。然而，現今的資訊秩序徹底挑戰這些觀點，權力已經改變且資訊化，權力本身是斷裂、拼貼及遊牧的（Diken, 1999; Lash, 2002, p. 189），不再存在於「線性」的論述裡，而是存在更為短暫的位元與資訊片段。因此，Lash（2002, p. 190）分析，在非線性時代中，Donna Haraway在科技科學的領域中，知識與權力相融合，從「論述結構」的霸權轉變為「資訊結構」（Lash, 2002, p. 191），最能徹底理解資訊世紀的權力結構，因為，科技科學並非透過論述的符號學來獲得有效性，而是透過絕對的物質事實性來獲得。

(三)從時間移轉到空間的權力

事實上，當Lash問：「何種空間的生產會成為全球資訊社會的核心」時，他所試圖強調的，是一種從時間移轉到空間的權力變遷。由於法國思想家Henri Lefebvre的空間思考被認為開啟現代性研究的空間面向，前瞻性為全球化理論的研究奠定深厚基礎（包亞明，2003），於是，Lash從Lefebvre的著作思考批判理論，也就是，從日常生活的基進唯物論觀點出發，提出對笛卡兒主義（Cartesian）的空間觀，以及結構符號學的批評（Lash, 2002, p. ix），不同於Foucault。雖然Foucault也談「空間是一個權力場所或權力容器，……空間是任何權力運作的基礎」（包亞明，2003）等，但Lash（2002, p. xi）認為，Foucault將權力視為在社會的微觀層次，仍是一種「線性」的知識—權力制度，以及在地（local）層次上運作的「論述」權力。

(四)資訊模式近用決定階級

Lash借用Tim Luke的概念，將「資訊結構」重新以「區域」（zone）劃分成四個空間，談世界資訊秩序的權力核心與非核心，資訊社會的階級，便是以資訊模式的近用來決定（Poster, 1990; Lash, 2002, p. 28）。所謂「活區」（live zones）和「死區」（dead zones）指的是「經濟空間」流動的出現與否，而「馴化區」（tame zones）和「野區」

1. 法蘭克福學派的「德國理論」（German theory），意指包括Theodor Adorno、Max Horkheimer、Herbert Marcuse以及Jurgen Habermas等人的著作，而「法國理論」（French Theory）則以Michel Foucault、Jacques Lacan、Emmanuel Levinas與Jacques Derrida等人為代表。

(wild zones) 指的則是社會成員「身份空間」的認同。Lash跳脫資訊「富者」和「貧者」二分的邏輯，強調結構的「流動性」，但僅僅以「四個區域」涵蓋當前「資訊結構」的變動，略嫌籠統，此外，忽略了「經濟」與「身份認同」之外，其他影響資訊社會階級的因素，也顯得較缺乏實際對應。

(五) 流動 (flow)、去疆域化 (deterritorialization)、再疆域化 (re-territorialization)

Lash借用「區域」、「流動」(flow)甚至「疆域」(territorialization)的概念來談權力，認為，一旦傳播與流動成為重心，而非社會行動與機構/結構時，社會學可能也開始受到「媒介學」(mediology)的影響(Kittler, 1997; Debray, 2000; Lash, 2002, p. 206)，媒介學關注流動的後工業「失序」，在流動的時代裡也將更臻成熟，而隨著組織化資本主義的終結，……導致一種逐漸增加的數位化流動的普遍化無差異，……但在某個點上，流動的無差異也開始團結起自己的疆域(territorialization)，或者說，團結起新的「去疆域(deterritorialization)」(Rodowick, 1997; Lash, 2002, p. 206)，這些新的(去)疆域並非新的結構、機構、組織與有機系統，它們是像平台、品牌、非地方性、廢物空間與模控的、開放的系統等實體(Koolhaas, 2001; Lash, 2002, p. 206)。簡而言之，就是以「傳播」概念來理解「去疆域化」，以及資訊流動的邏輯如何「再疆域化」納入一個新的商業形構、平台、標準、智慧財產以及網絡之中。

(六) 植基於媒介空間的資訊資本主義批判

前述論點，正是Lash在**資訊批判**中所試圖傳達的「傳播新經濟」，然而，仔細分析，究其本質，其實類似資本主義政治經濟的一種邏輯形式，不同的是，傳統財產權的衝突，轉變成了以資訊、知識爭奪的階級衝突：以資訊結構區域所佔「位址」，決定權力的中心與邊陲，在資訊點上居優勢者成為權力核心，將劣勢者「排除」淪為邊陲，接近一種植基於媒介空間的資訊資本主義批判觀點。只是，Lash廣義的點出，流動的經濟就是傳播。……傳播涉及商品與人的移動，因此流動的理論也是傳播理論(Lash, 2002, p. 205)，使理論範疇更形開闊。

二、全球資訊新秩序——技術文化

關於全球資訊秩序，Lash所著重討論的，是「傳播的現象學」，更

精確的說，是「技術的現象學」（technological phenomenology）。

(一)「呈現」取代「再現」

Lash提出新的資訊秩序指出，全球資訊秩序是一種「技術文化」，也就是說，過去是一種敘事、論述以及影像文化的「再現」，使得讀者、觀者或閱聽眾在一種二元的關係中相遇，但在「技術文化」中，文化不再主要由「再現」形式所構成，是一種「呈現」，使用者與遊戲者在同一空間中（Lash, 2002, p. x），而「遊戲」（play）便是一個技術文化的活動模式、典範。

(二)「附加性」取代「因果性」

Lash除了透過對「遊戲」概念的探討，試圖掌握在資訊社會中「再現文化」到「技術文化」的轉變外，技術文化遠距傳播的特點，帶來了機械中介的議題，這種機械中介傳播正是資訊秩序的權力新典範（Lash, 2002, p. 175），使得在傳統產製社會的「再現」文化中，扮演優勢角色的「因果性」，在技術文化中，被「附加性」（additivity）所取代（Lash, 2002, p. xi-xii）。

(三)「自反性」（reflexivity）

Lash同時談「自反性」（reflexivity）的問題。在空間與時間反思（reflection）消失之際，「自反性」是建構生活形式意義最直接的辦法，這種「自反性」模式中，世界意義無須先驗的主體即可產生，世界的意義是透過參與一個既定的生活形式中，成員之間外在的、經驗的傳播而產生（Lash, 2002, p. xi）。於是，資訊秩序可理解為社會再生產（reproduction）以及象徵秩序再生產的危機。

(四)返回理論脈絡檢視「如何可能」

以上論述，是Lash對於全球資訊新秩序「媒介地景」的觀點，不可謂不具「創意」及思考價值，但問題在於，許多關鍵概念和邏輯顯得模糊又陌生，而結論也往往需費神理解，令人如墜五里霧中，不明所以。因此，檢驗「批判內在於資訊之中」的結論如何可能，除了解釋Lash論點「其然」，還必須理解「其所以然」，這至少涉及兩個層次的理解，首先是，釐清Lash提出一連串傳播領域中陌生的概念所謂為何？理論依據是否足以支撐？其次，才得以判斷「如何可能」的問題。

參、傳播社會與「自反性」

這透露出某種涉及資訊社會中的「解資訊」(disinformation) 狀態，……這個矛盾本身就是一連串「不預期的結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也就是說，一個愈來愈資訊豐富與智識性的生產過程，卻導致了一種「反知識」的結果，例如：資訊超載、短暫即逝、「弱智化」(dumbing down) 等等。這種逐漸朝向資訊密集的生產方式，假定一種高度的「自反性」(reflexivity)，知識社會是一種「自反性」社會，而我們所討論的社會亦處於「自反性現代化」(reflexive modernization) 之中 (Lash, 2002, p. 49)。

Lash之所以針對傳播社會「新秩序」的「權力」做出「排除原則」、「非線性」、「非論述」、「空間化」、「流動」等定義，從理論脈絡解讀，其實，「自反性」(reflexivity) 是其中極為關鍵的概念，因為它不但涉及批判之所以使得上力的權力問題，對於「資訊批判回到資訊的內在本身」如何可能，也具有一定程度的解釋力。但何謂「自反性」與「自反性現代化」(reflexive modernization)？相關理論是否足以支撐其論點？回溯理論源頭，應該和Lash多年前與德國社會學家Ulrich Beck，以及英國社會學家Anthon Giddens共同勾畫「自反性現代化」的理論有關。

事實上，Lash、Beck及Giddens三人對於「自反性」的理解有些微差異，因此，無法將理論內涵「一言以蔽之」，而如果只從Lash的觀點來看，以他所談的「美學自反性」(aesthetic reflexivity) 指向一種危險的現代性，也就是：「現代社會越發展，現代性越完善，其賴以存在的現代工業社會的基礎，就越是受到威脅甚至消解」(Beck, Giddens & Lash, 1997/趙文書譯，2001)，那麼，Lash所謂的「自反性社會」以及社會處於「自反性現代化」之中，便不難理解。

暫且擱置理論細節，將三人的「自反性現代化」(reflexive modernization) 理論「求同存異」，延伸至科技匯流的傳播社會加以解讀，所謂，社會中充斥著「自反性」的知識，是因為這些知識未必使我們得以掌握自身在傳播洪流中的命運，反而某種程度上，對人類造成威脅，這些威脅往往來自於人類與傳播科技「互動」的「成就」，而不見得來自於所謂的「危機」或革命。人類努力突破科技，建構傳播社會的未來，但這種嘗試卻妨礙「美好」未來的出現，或者更具體的說，許多「不預期結果」的出現，正是人類企圖控制的「努力成果」所造成的。最後，

對於生活技術形式產生影響的，便不一定是正式的傳播決策體制，甚至，正統的體制在毫無「巨變」甚至革命的情況下，反被重新塑造了。倘若解讀無誤，Lash所說，處於「自反性現代化」之中「自反性社會」的樣貌大致這般。

然而，即便Lash精準地延伸應用「自家」理論，但真正核心的問題是，這對傳播社會運作批判的空間而言，又有多大的參考價值。由於，Lash藉由自反性理論的陳述，目的在發展他對客體的概念，因此，必須進一步回溯自反性理論的源頭，釐清客體的邏輯與輪廓，才得以更明確解釋「如何可能」。

一、自反性 (reflexivity)

「自反性」最早出現在Kant「反思性判斷」(reflective judgement)的觀念裡。Kant (1952) 的第三批判：**判斷力批判** (*The Critique of Judgement*)，往往被解讀為「美學」批判，因為，Kant將理性的認知，理解為決定性的判斷，意味著主體概念下對客體的歸類 (subsumption)，但其批判著作的延伸，便在於證明，認知理性與決定性判斷有其限制。然而，美學判斷是關於反思的判斷，主體不再能在一個既定的規則或概念下來假定客體，作為「物自身」(thing-in-itself) 的客體從未被直接地掌握，它開始變得只能經由對自然、藝術或其他文化事物的「經驗性」體驗才能被主體知覺到。Kant所企圖說明的是，在啟蒙裡，客體意圖從主體的掌控中逃脫，或多或少有了自主性 (Lash, 2002, pp. 49-50)。

同樣的，Lash界定他所謂「啟蒙」的概念，既非現代也非後現代，而是一種極為傳統的概念，啟蒙不僅蘊含主體開始領悟到「他的」限制，也認知到客體的自主性 (Lash, 2002, p. 50)。於是，Lash (2002, p. 63) 寫到，自反現代性的理論遺忘了客體，然而，「不預期結果」理論的核心概念，已經為客體的社會學預留一個空間：也就是為客體的社會學預留一個可以跳脫自反性主體掌握的空間。Lash的「美學自反性」特徵之一，便是不存在主客體的抽象對立。

從理論回到傳播社會現實，在數位科技匯流趨勢下，以資訊技術應用為例，電子網路幾乎「嵌入」人類的生活世界，成為不可分割的一部份，而套用葉啟政 (1996) 的說法，正巧相反，是「人們的生活世界被『嵌進』電子網路中，電子網路成為『自主的怪物』」。這種資訊世紀的景象，Lash在**資訊批判**中，藉由引述Bruno Latour、Paul Virilio以及Walter Benjamin的著作，討論「不受控制的客體」(Unruly Objects)²，的

確提供不少極具思考價值的面向。

正因為Latour與Virilio都不是結構主義者，著作中主要是關於擁有能動性的客體，因此，Lash (2002, p. 63) 檢視Latour的觀點，突顯出客體本身如何變得具有「自反性」，在知識的生產與知識信號的時空延伸裡，自行判斷、編織形態、詮釋與傳送，這些客體完全不同於「論述」，同樣的，Virilio的論點也呈現出，監控與治理並非存在於「論述」之中。於是，Lash再以Benjamin「填補」縫隙，綜合三人論點結論指出，「自反性」的結果就是「準客體」(Quasi-Objects)³、「壞客體」(Bad Objects)⁴與「死客體」(Dead Objects)⁵的出現(Lash, 2002, p.

2. 在思想的路徑上，Lash承認是因為閱讀了Virilio的著作後，開始以媒體的「機械」本質來理解Baudrillard (1978; Lash, 2002, p. 66) 所指，七〇年代，「社會」漸漸被吸納入「媒體景觀」這個觀點，而後來與Benjamin，尤其是McLuhan的接觸，才真正意識到媒體的資訊本質。因此，Lash根本上被說服，相信媒體具有客體、技術的特質。
3. Latour以他所謂三個主要「保證」(guarantees)的結構來理解現代性。首先，自然或客體是「先驗的」，並非人類建構出來，只是被我們發現。其次，社會(主體、國家)被理解為內在性的，由公民「人為的」(artificially)自由建構。第三則是確保前述兩者間權力的區分。然而，Latour認為，這種現代的二元論只是神話，透過科學社群所建構的自然(例如：事物、科技)是內在性的，藉由社會與國家流動所構成，但另一方面，社會與國家參與了「非人類」所進行的現代化，某種程度而言，擁有了持久性(duree)，甚至是先驗的。如此一來，倘若現代性裡的客體是先驗的，那麼這些真實存在的「非人類」就不全然是客體，而是「準客體」(Quasi-Objects)。至於集體的與個人的主體建構而成的，是先驗的，但並非變成主體，而是「準主體」。這正是Latour何以主張「我們從未真正現代過」，因為，我們總是被包裹在一個「第三王國」裡，介於內在與先驗的兩極之間。Latour關於「準客體」的實用主義例子，建構了現今逐漸出現的全球網絡以及所謂的「中間王國」(middle kingdom)，也就是今天的符號與空間經濟，準客體的例子包括：冷凍胚胎(frozen embryos)、數位機器、混種玉米(hybrid corn)、資料銀行、感應裝置機器人、雷達回聲測深裝置、基因合成等。
4. 倘若Latour的現代與後現代客體指的是好的事物，那麼，Virilio的客體便是壞事物——「壞客體」(Bad Objects)。Virilio被Lash視為是第一個風險社會的理論學者，對Virilio而言，美好事物、美好生活、理性對話的批判空間，都是由事物所保護的，這些事物像是：城牆、壁壘、碉堡與瞭望臺。而科技是移動的客體，透過運動摧毀空間，它們是危險份子、偶然的事件，是壞的事物。於是，隨著好的事物的消失，所有遺留下來的都是壞的事物；是一個完全屬於客體與機器的時代，即使是身體也是一個變形的機器。如今，所有的機器都是「戰爭機器」，這種「戰爭機器」開始被Virilio所謂的「視域機器」(vision machine)取代了。倘若Virilio式的前現代客體是指城牆、碉堡，那麼那些(早期的)現代性客體就是指交通工具、坦克、車輛、火車、卡車等變形的機器(Virilio, 1989)，而在視域機器的晚期現代時期中，實用性的客體則是指訊號：光速移動的訊號。在視域機器的時代裡，移動的不再是機器，機器不再是交通工具，反而變成一個框架，這

63)，並藉由「自反性」理論，掌握這種「理性與非理性併置」的特性，主張必須從資訊「秩序與失序」的內在性，排除一種「先驗」、「主體對客體批判」的觀點來面對，才有助於人類理解資訊技術本質，在應用資訊科技時，面對所謂「非人」(non-human)的價值、態度、方法及未來的籌畫等，避免產生更多「不預期」甚至「失控」的結果。

事實上，人類與技術「互動」並未完全喪失其積極性，Lash所試圖提醒的是，傳播技術已經使得電子網絡構成人類的日常生活世界，成為一個「非線性」思考、溝通傳播的「框架」，無法再由人類以「線性」的傳統模式支配，反而使得人類的日常世界被傳播技術牽引，形構為電子化傳播的「儲存物」框架，以適應傳播科技匯流社會的特性所需。更明白的說，今天，「人」未必一定是媒介、資訊、技術的處理者，而媒介、資訊、技術甚至自然也未必只能待處理，「人宰制自然」的邏輯，不再理所當然，當前普遍的電腦犯罪、電腦病毒、網路駭客、智財權、人權、隱私的侵犯，甚至資訊倫理、資訊氾濫等，都是「技術」與社會「互動」後，伴隨著傳播資訊科技而來的「不預期結果」，如此一來，批判著力的「權力」之處，「主體」是誰？「客體」是誰？「先驗」的制高點又何在？這是Lash之所以主張，排除「先驗」、拋棄「主體對客體批判」的邏輯所在。

唐士哲(2003)評論指出：早期傳播效果研究注重資訊傳輸過程的測量，以及近年來傳播文化取徑對於「有意義的傳播」的堅持，出發點都是將媒介視為服務人類傳播/溝通欲求的「工具」或內容「載體」(carrier)，但Lash卻在於指陳，當「載體」成為「主體」，而傳播/溝通的欲求成了特定資訊科技形式建構的「結果」時，人們面對傳播/溝通的必然性所顯現的疲態與被動。這裡點出「人們的疲態與被動」，其實也正是「自反性」的結果。Lash強調，自反性理論可以用來理解壞事物的積累，而壞事物的儲存則往往伴隨著(資訊性)好事物的儲存與積累一起出現(Lash, 2002, p. 63)。

個框架使得光可以在光速下移動。不僅是我們觀看電子光學機器，視域機器也同時觀看我們。透過投射物的治理(而非透過論述)，開始轉變成機器的監控。

5. Benjamin對於客體的概念，在他的著作*德國悲劇的起源*(*Origins of German Tragic Drama*)面世之前，歷經了一個巨大的轉變。之前，他將客體視為活生生的、充滿靈性的，透過客體，神祕性就可獲得補救；如今，他的客體卻被扼殺了：客體的世界變成一個死亡的世界——「死客體」(Dead Objects)。Benjamin晚期的著作裡，開始將現代性理解為一個死客體的世界。

二、自反性現代化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回到Lash、Beck及Giddens三人對於「自反性」理解的差異，以進一步探討理論對「自反性傳播社會」內涵的提示作用。

Beck在「再造政治：自反性現代化理論初探」中定義「自反性現代化」指出，我們將「自主的、不受歡迎的、看不見的」從工業社會向風險社會轉化的過程稱之為「自反性」，那麼，「自反性現代化」便是指，導致風險社會後果的自我衝突⁶ (Beck, Giddens & Lash, 1997 / 趙文書譯, 2001)，……這種格局在後來的第二階段可能會成為（公眾的、政治的和科學的）反思目標。Beck將「自反性」區別於「反思」(reflection) 並與之對照，「反思」是知識的，但「自反性」卻是無意的自我消解和自我危害，「自反性現代化」的「媒介」正是這種「非知識」、「見不著、想不到」的東西。

至於Giddens，談的是「制度的自反性」，「自反性現代化」階段最顯著的特徵是，全球化和最傳統的行動情境撤離的雙重過程，這個階段改變了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的平衡。於是，在「自反性現代化」階段，傳統喪失了控制力，不再為個人和制度的可靠或可信性提供擔保，「……我們全都不由分說地捲入了一場宏大的實驗；這場實驗由我們來進行，同時又在極大程度上超越了我們的控制」，這意味著「風險社會」(risk society) 的來臨 (Beck, Giddens & Lash, 1997 / 趙文書譯, 2001)。總之，全球化幾乎使得一切都具有了相關性、暫時性、不確定性和面對未來的開放性；也正因為如此，Giddens說，我們第一次生活在完全後傳統的社會中⁷。今天，我們生活中面臨的許多不確定性，正是由人類知識增長所創造出來的。

事實上，如果根據Lash替英文版**風險社會** (Beck, 1992) 所寫的引

6. 工業社會變化悄無聲息地在未經計畫的情況下緊隨著正常的、自主的現代化過程而來，社會秩序和經濟秩序完好無損，這種社會變化意味著「現代性的激進化」(a radicalization of modernity)，這種激進化，打破了工業社會的前提並開闢了通向另一種現代性的道路 (Beck, Giddens & Lash, 1997 / 趙文書譯, 2001)。……不必一定標誌著社會巨變的分崩離析和痛苦經歷，而是僅僅意味著簡單現代性的瓦解的跡象、強勁的經濟增長、迅速的技術化……推展或攜帶工業社會進入一個新的時代風暴。
7. 關於這一點，Lash是贊同的，他在**資訊批判**中也寫到：像是Beck與Giddens之類的社會學家都主張，我們生活在一個「自反性現代性」(reflexive modernity) 的時代裡，在其中，早期簡單現代性的最後傳統足跡，已經被「反思性」地消除了 (Beck et al., 1994; Lash, 2002)。

言，高度評價Beck的風險社會理論，同時，另一方面也承認Giddens的時空延伸與自反性概念對其思想影響之深遠（Beck, Giddens & Lash, 1997／趙文書譯，2001），那麼，Lash基本上是認同Beck與Giddens對「自反性現代化」和「風險社會」的理解，所不同的只是，Lash增加了美學（闡釋學）的維度⁸，因為Lash認為，Beck與Giddens主要來自關於不確定性的科學思想以及科學干預所造成意外後果的想法，這是不充份的，因為，在日常生活中，這種感受力更多是來自美學感受力或闡釋感受力。

Lash（2002, p. 50）指出，自反性涉及主體對客體的自反性監控，其中，主體藉由規則來歸類（subsumes）客體，但這僅論及部份的「自反性現代化」理論，其他還包括「不預期結果」、風險與不確定性等面向。也就是說，我們愈是進行監控或自我監控，就愈是認知性地去歸類客體，我們愈是掙脫控制，就愈具有風險與不確定性。我們愈是監控客體，客體愈是脫離我們掌握之外。我們愈是奮力縮減風險量，就愈生產出其他的不確定性。我們愈是自反性地嘗試排序我們的生活敘事，……它們就愈是逃脫我們的控制。於是，這個偶然的時刻、客體或自我所在之地的片刻，逃脫了主體的認知範疇，而屬於「美學的」範疇。

因此，在資訊批判中，Lash之所以與Beck和Giddens極力區隔的，主要是Giddens等人相信，制度和專家系統仍具有重大作用及影響⁹，但Lash的「自反性現代化」不是知識、制度、架構和規範的「自反性」，而是涉及到制度以外的「邊緣」領域，涉及習慣、無意識、身體的習俗和未被考慮到的範疇；它是比知識、制度或架構的「自反性」更激進、不經過中介的「美學的自反性」。也正是這套邏輯，Lash在資訊批判中，將這些特徵廣泛賦予在資訊、組織、技術本質、媒介理論甚至技術的生活型式與技術文化上¹⁰。

8. Lash在自反性現代化：美學維度中，將審美現代性這種「辯證對立」的理念做了新的闡釋，超出反思、批判甚至對抗的理念，「美學自反性」——作為諷喻或解構，……這種「自反性」並非只是對啟蒙現代性的批判，也不僅僅是現代性的自我相關性和自我指涉性，而是指向一種危險的現代性：「現代社會越發展，現代性越完善，其賴以存在的現代工業社會的基礎就越是受到威脅甚至消解」。
9. Lash認為，Giddens在假定系統和生活世界抽象二分的情況下，想透過民主對話和語言，在實際中的使用作用於系統，從而為生活世界爭取空間，實現主客體的統一，根本不可能。對Lash而言，根本不存在系統和生活世界、主體和客體的抽象二元對立，也就沒有必要經過制度或知識的仲介，實現主客體的統一。
10. 由於「挽救闡釋學」尋求一種對話，但不是以知識、制度或架構為仲介的對話，因此，Lash在資訊批判中，強調了Pierre Bourdieu的「挽救闡釋學」（retrieval hermeneutics），由它所形成的「闡釋性真理」（hermeneutic truth），在「美學

不過，從Beck與Giddens的角度來看，他們都認為被Lash誤解了。Lash (2002, p. 170) 堅持，在Beck的「自反性現代化」中，個體是一個判斷者，他所強調「現象學是自反性」，個體是一個見證者，但事實上，Beck已區別了「自反性」不同於「反思」，「自反性現代化」的媒介不是知識而是「非知識」，是簡單現代性「看不見、摸不著」的副作用。而Giddens也說過，他所理解的「制度的自反性」總是和情感有某種聯繫，不能說僅僅是「認知的」，……科學知識所造成不確定性和它所解決的一樣多，只是他認為，即便知識和制度有局限性，但我們仍需經過這些中介來溝通主客體的關係。

儘管Giddens在「風險、信任、自反性」一文中也曾經質疑：「有美學自反性這回事嗎？我想沒有……」，但可以確定的是，三人都反對「簡單現代化」的社會學¹¹。根據Beck的分析，「簡單現代化」將社會變革的原動力，定位在「工具理性」範疇之中，是「反思」的，但「自反性現代化」認為，社會變革的原動力存在於「副作用」之中，也就是「自反性」。既然Lash承認，沒有任何理論家對他的影響，能超過Beck與Giddens (Beck, Giddens & Lash, 1997 / 趙文書譯, 2001)，那麼，即便三人對「自反性」的理解有所差異，原則上，並不影響藉由這個理論，進一步對於資訊傳播科技匯流可能出現「自反性」傳播社會所具有的提示作用。

三、思考的「中間路線」

後現代社會批評對於「物性」的批判，主調往往是彰顯高度理性的科技社會所造就的非理性、去人性溝通／傳播情境，而Lash長久以來關切的，是資訊文化的生產在高度科技化、資本化社會中，如何重新建構空間與時間觀，更進而影響社會關係的形成（唐士哲，2003）。這段評論，點出Lash對於社會型態移轉的強調，但另一方面，唐士哲（2003）也批評Lash，只在科技形式上作文章，而不處理溝通的內容、情境，以及使用者在日常生活中面對資訊時如何應對，使得Lash論證的效力，不脫他事先決定的觀察視野。

的自反性」階段，在習俗和習慣中，在生活的意義之網中，透過理解和闡釋形成社群的共享意義。事實上，晚期的Benjamin也實踐了一種「挽救詮釋學」，只是，被補救的都是那些無法被補救的事物，因為它們早已死亡 (Lash, 2002, p. 62)。

11. 簡單現代化的社會學綜合兩種類型的樂觀主義：(1)線性的科學化，(2)對副作用的預期可控制性的信仰。

不過，從另一個角度解讀，即便Lash關懷的重點僅侷限在「技術形式」，而「自反性現代化」（reflexive modernization）理論也正是Lash「既定的觀察視野」，但若用以觀察傳播科技匯流社會，仍具有提示作用及闡釋效力的話，其實未嘗不可。

唐士哲（2003）不贊同的是，Lash探討資訊科技建構社會感時，所透露的悲觀語調：Lash強調「再現的危機」（the crisis of representation），雖是資訊氾濫現象的表徵，但表象溝通／傳播情境的紊亂、破碎，或失序，是否等同意義的不可能，甚或主體的淪喪，不能單從科技化日常生活的面向一以斷之。溝通的形式化與去目的化，並不能等同溝通意義的消亡。科技形式日新月異，但意義的產出，在每種新科技主導下，充其量暴露的是性質上的改變，而不是主體性的危機（唐士哲，2003）。顯然，Lash也不免招致「技術決定」的批評。

的確，Lash也談「解資訊」（disinformation）¹²的社會，但倘若以為Lash所謂的資訊社會都是非理性的，卻是天大的誤解，因為Lash說的是，理性與非理性的同時存在。因此，解讀Lash的論點，即便將一堆諸如「紊亂、破碎或失序的資訊」、「意義的不可能」、「客體的失控」、「主體的危機」、「溝通形式化與去目的化」等概念……對立起來，其實意義不大，也不是我們藉由Lash觀察傳播社會的最大斬獲。不妨回到Beck的觀點，置身「風險社會」（Lash所謂的「風險文化」），我們既不必像現代主義者那樣樂觀，也不必像後現代主義者那樣感到悲觀，因為，風險意味著人們試圖避免的消極後果，但另一方面，承擔和管理風險，某種程度上，也具有積極的意義。

在有關「技術決定」的爭論中，既然科技或技術本身並非決定的唯一力量，事實上，科技或技術的形成與使用也受到結構性因素的影響，那麼，在所謂的「辯證」關係之外，應該還有更多元的思考空間與可能性。Lash與Beck及Giddens共同勾畫的「自反性現代化」理論，曾經為現代主義者與後現代主義者之間的爭論，提供「第三條道路」，而倘若Lash的論述具有參考價值，在傳播領域中，也未嘗不是一條思考上的「中間路線」。

12. Lash主張的「解資訊」是資訊化的「不預期結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與資訊的超載有關，資訊價值短暫即逝、立即，沒有過去，也沒有未來：沒有反思的空間與理性的論證，不像言說或論述分析。例如：報紙報導新聞的權力並非來自於論證，而是透過一種極為暴力且威力十足的現實性而來，在截稿壓力下，它的威力與時間性類似於事件所呈現的暴力性，純粹是經驗主義的，而非先驗的。倘若資訊社會是關於自反性的，那麼，「解資訊」便是關於「反思的不可能」。

肆、「資訊批判」內在於資訊本身

我們無須在全球傳播流動之外，去尋找一個可以用來批判的可靠支點，因為，不再有所謂的外在存在，資訊批判內在於資訊本身之中（Lash, 2002, p. 220）。

這是**資訊批判**結論章節中的最後一段話。本文先前花費篇幅釐清Lash所提「資訊新秩序」輪廓中關鍵的概念與邏輯，目的便在於回到**資訊批判**的核心論點：「資訊批判內在於資訊本身」的具體性，如何收攏來自各路脈絡的理論，得以可能。

Lash認為，淵源於十九世紀以「意識型態」為核心的批判理論，都有其「先驗性」，在進入資訊世紀後，資訊將後設敘事壓縮成一個點、一個符號，甚至一個即時事件，隨著時間與空間的壓縮，當社會中符號權力（symbolic power）不再具有構成「意識型態」的信念系統形式、普遍性的宣稱不再成立、批判理論也不再具有闡明社會效力時，成長於「意識型態」世紀的批判性社會科學，其批判性的思維在資訊世紀中是「行不通」的。

說得更清楚，晚近現代與後現代批判理論，原則上，根源於兩種不同類型的批判理論：質疑（aporetics）與辯證（dialectics），前者思想源於Kant，後者來自於Hegelian，正因為兩類批判都必須立基於「先驗性」¹³，所謂「先驗性」，意味著一個制高點，無論是提出普遍性（universal／現代性的）或差異性（difference／後現代性的）聲稱（Lash, 2002, pp. 93-94），都存在反思的時間與空間距離（Lash, 2002, p. 1），然而，在數位媒介匯流的今天，資訊快速增生，人們淹沒在訊息洪流之中，即便針對特定文本內容試圖批判，也會因為資訊的壓縮、即時、短暫性（ephemerality）而減弱甚至失去批判力道，這是理論上Lash之所以說「行不通」的原因。

這同時牽涉到，前述討論Lash藉由自反性理論的陳述，發展客體的概念，提出在「自反性現代化」傳播社會中，主體開始認知到自身的限制以及客體的自主性，甚至出現「不預期結果」，於是，主體不必然站在制高點掌控批判，必須排除「先驗」，拋棄傳統「主體對客體批判」

13. 對於法蘭克福學派而言，「系統」（system）、認同與工具理性構成了經驗領域；而生活世界、虛無以及溝通理性則構成了先驗領域。至於法國理論，經驗是指「同一」、「在場」（presence）或後設敘事；而先驗則是指「它者」（the other）或延異（différance）。

的二元觀點，以一種「體驗、接觸」藝術之類的東西那種方式來知覺客體，理解媒介、資訊與技術本質。

顯然，Lash「資訊批判」的重點，既不是辯證（*dialectics*），也不是質疑（*aporetics*），更與意識形態或霸權無關。分析Lash的概念，一方面來自Bataille的「過量」（*excess*）：真實的原始空間，這使得符號再生產成為不可能，於是，資訊批判既不是符號與意識形態競爭的問題，也不是想像共同體的問題。至於，「傳播溝通的空間」（*a space of communication*）概念，則來自於社會學家Niklas Luhmann所強調的，社會聯結本身不再是在象徵符號中交換，而是從「傳播溝通」展開。因此，Lash說，批判理論必須重新改造（*reconfigured*）才能掌握資訊秩序，而由於本文旨在檢視Lash所提出「資訊批判」如何可能，因此，關於批判理論是否真的不可能，未來有意研究者，不妨併同檢驗Lash的論點。

從理論再回到現實，這所謂排除「先驗」、拋棄「主體對客體」的批判究竟如何進行？Lash（2002, p. 218）指出，資訊秩序內容的單位是「概念」（*idea*），這個「概念」並非透過意義來運作，而是透過「操作性」（*operationality*），批判就是透過操作（而非符碼）來運作。但問題是，「概念」、「操作性」與「資訊批判」有何關聯？如何「操作」批判？

唐士哲（2003）認為，Lash的觀點是，資訊的主要問題，已不是「它究竟是什麼意義（*what does it mean*）？」電子郵件、大哥大手機、網際網路，以及電視在日常生活的普及，使破碎、偶發、中介的溝通行動成為常規，面對這些資訊的特質，批判的實踐無法自外於現象超然以對，批判的新任務，應是融入由資訊所建構的社會與文化情境中，從大量、速成、用過即丟的資訊裡，整理並彰顯資訊秩序（或失序）現象背後的「操作性」（*operationality*）。與批判傳統（以「評斷」（*judgment*）、「解讀」、「解構」、或「意識形態批判」為宗），明顯劃了一道界線。

然而，關於「如何可能」，還是必須回歸理論脈絡，才得以清晰。進一步分析Lash的思維，可以發現，藝術理論學者Sarat Maharaj提供了「概念」、「操作性」與「資訊批判」的相關線索，至於資訊批判中所謂的「思考」，則是來自於Benjamin的「震撼經驗」（*Chokerlebnis / shock experience*），也就是說，批判透過「震撼經驗」而得。

一、觀念藝術「自反性」

Sarat Maharaj 是一位研究 Duchamp 的學者，Lash 認為，Duchamp 的觀念藝術是最原始的「媒介理論」，他作品裡的客體既是短暫性的也是持續性的，與觀念藝術同樣在構成上具有「自反性」，觀念藝術是「自反性」的、批判的，它是它自己存在狀況的「自反性」批判 (Lash, 2002, pp. 219-220)。Maharaj 將觀念藝術帶到資訊批判的舞台上，將藝術延伸為對於產製機構與藝術的全球性流通之間權力關係的觀念批判，這個批判並非透過理性的論述或內在的反思，而是透過一種未完成的藝術過程外在化的「自反性」。

說得更白話一點，由於形式主義的藝術作品必須透過意義，藝術家才得以與詮釋的觀者進行協商。但觀念藝術的作品都具有未完成的特徵，某種程度降低了藝術家的地位，讓觀眾完成作品。尤其，觀念藝術就是關於傳播的價值短暫性 (value-brevity)，在 60 年代晚期的觀念藝術裡，有一種很強烈 McLuhan 式的脈絡存在 (Craig-Martin, 1999; Lash, 2002, p. 217)，觀者變成了使用者，詮釋變成了符碼。正因為不完整，所以，觀者必須將剩餘的部份填補上去，變成了操作者，不再進行詮釋，而是從事創作。因此，觀念藝術涉及一種「反美學」 (Foster, 1996; Lash, 2002, p. 217)，不具藝術本質，美學判斷與美學主義同時消失。

當美學判斷變成了不可能達成的事，便沒有所謂的有效時間可以進行判斷；隨著判斷與被判斷事物之間的無差異化，也不再存在有效的距離，於是，判斷位於一個「操作性」的立場上進行，這也就是 Lash (2002, p. 218) 之所以認為，觀念藝術與資訊秩序都傾向於化解差異，併入一種普遍的無差異性，因為，觀念藝術既沒有美學也沒有判斷，同樣的，資訊的批判也是「非判斷性」的。而 Lash 就是打算將這種「自反性」批判，更廣泛地延伸到全球資訊與傳播秩序中。

整合 Lash 所試圖論證的邏輯理路，可以做如此的理解：傳播社會 (或者說資訊文化) 就像是一個未完成的「觀念藝術」作品，資訊使用者面對未完成的資訊，不是去「解讀」而是去「完成」，成為填補意義破洞的「操作者」，所謂使用者，不僅是普羅大眾，也包括批判者。如果批判的本質是「思考」，資訊批判的思考倫理不是意義的提示或解讀，而是意義的操作或補充 (Lash, 2002, pp. 209-217)。於是，主體不再佔據先驗的制高點，而客體又或多或少有其自主性，不再有主體對客體所謂既定或完美的外在判斷標準，也沒有有效時間和足夠的距離可以進行判斷，資訊批判必然回到資訊內在本身，因為「自反性現代化」的

傳播社會中，傳播科技本身的「成就」，很可能正是造成數位匯流失序的原因，批判者只是將「不足」、「未完成」的部份予以填補，類似一種「附加」、「補充」使其修復或取得完整性的「操作性過程」。至此，Lash的理論脈絡，似乎愈來愈清晰，也確有其參考價值。接下來的問題是，如何將「觀念藝術」與「震撼經驗」聯繫起來操作資訊批判。

二、「震撼經驗」（Chokerlebnis / shock experience）

在觀念藝術裡，藝術會做哲學性「思考」，Lash的**資訊批判**倘若透過「思考」（thought）獲得，應該就是源於Walter Benjamin的「震撼經驗」（Chokerlebnis / shock experience）。Lash（2002, p. 134）引用Benjamin的觀點指出，資訊的立即性時間意味著一種震撼經驗的第三經驗模式，震撼經驗既非「傳說」的也非「敘事」的時間，而是「現在」（nows）的連續。震撼經驗……發生在一個無差異的時間性裡，這個時間性的經驗不再是關於時間（time），而是關於「速度」。

Benjamin將現代社會無處不在的感官刺激，稱之為「震撼經驗」，以「震撼」來形容現代技術社會的體驗形式，是一種「驚嚇性的侵入」，是人們「連續性經驗」斷裂的標記。因此，電子傳播媒介為人們帶來的經驗，用Benjamin的話形容，就是「震驚」：照相機賦予瞬間一種追憶的震驚（張旭東、王斑譯，1998）。

然而，從Lash引用Freud論及潛意識的「觀念」（Lash, 2002, p. 219）來看，所謂「思考」、「批判」應該是潛意識的，也就是說，「震撼」這個概念與Benjamin同樣是借自Freud而來，意指人在毫無思想準備的狀態下，突然陷入外界高能量的刺激，……神經性刺激迅速而不斷湧入個體，個體在長期的洗腦下，失去自覺與防備的能力。Benjamin根據Freud**超越快樂原則**中的論點指出，對於一個生命組織來說，……它的能量抵制著外部世界過度的能量影響，而這種過度的能量會導致潛勢的均等以致導致毀滅，這些能量對人的威脅也是一種震驚（張旭東、王斑譯，1998）。於是，作為技術時代典型的文化徵候，「震撼」呈現的是，個體被摘除或剝離了情感、想像、意志和自由意識的分裂和片面狀態¹⁴，「震撼」之下，人們不再進行交流、抒情和溝通，而是冷漠、孤寂和偏執。在這層意義上，Lash針對技術文化、媒介社會特質的種種描述，恰恰呼應出類似的看法。

14. 其實就是一種精神異化，更是一種物質世界的機械規律和逐利法則不斷入侵、干擾、管轄、操縱人們心靈韻律的「刺激／反射」過程。表象的繁華遮蔽了個體的感性，刺激成了唯一的消費。

另一方面，Benjamin在**啟迪**中收錄1939年所寫的「論波德萊爾的幾個主題」，試圖建立「現代城市」與「震撼經驗」(shock experience)的關係，顯然「震撼」的概念與波德萊爾的詩歌「震驚」有很大的關聯。波德萊爾把震驚經驗放在他藝術作品的中心，震驚是一種現代經驗，快速的現代交通導致行人在人群當中得到的震撼經驗，就像機器馴化的工人在機器旁一樣，波德萊爾說，「一個人扎進大眾中，就像扎進蓄電池」，他稱這種人為「一個裝備著意識的萬花筒(kaleidoscope)」(張旭東、王斑譯，1998)。於是，現代社會速度越來越快，事件愈趨複雜，但人類的感知卻愈顯狹隘，這或許就是Benjamin所形容的，「技術使人的感覺中樞屈從一種複雜的訓練」，「行為是一種對震驚的反射」¹⁵。

總括來說，Benjamin認為，人們感知的手段發生了變化，這種變化表現為人們的感知手段重新有了新的組織形式。如果，傳統藝術較重視具有永恆性的膜拜價值，那麼，機械複製時代，藝術作品價值則來自於複製技術「大量生產」，呈現或展示手法所帶給觀賞者的「震撼」。

Benjamin寫到：抒情詩的創作如何能夠以這樣一種經驗作為基礎？對於這種經驗來說，震驚成了規範(張旭東、王斑譯，1998)。波德萊爾想使現代人敏感起來，付出的代價就是「在震驚經驗中的靈光的分崩離析」¹⁶。事實上，機械複製時代的來臨，就是藝術「靈光」的消逝，因此，Lash藉此延伸強調的「媒介理論」也絕不是關於「靈光」的媒體，那種長期的再現，而主要是關於媒體的內容，資訊或訊息短期(short-duration)的呈現，運作方式是透過一種類似於它的客體的形式。於是，原本，理論在本質上是透過「論述」而得，但「媒介理論」卻改變了這一點(Lash, 2002, p. 74)，是一種「非論述」的。

因此，雖然Benjamin曾反覆讚嘆相機的發明：「……用手指觸一下快門，就使人能夠不受時間限制地把一個事件固定下來」(張旭東、王

15. Benjamin寫到：震驚的因素在特殊印象中所佔的成分愈大，意識也就愈堅定不移的成為防衛刺激的擋板，……這種防範震驚的功能，在於它能指出某個事變在意識中的確切時間，代價則是喪失意識的完整性，……這是理智的一個最高成就，它能把事變轉化為一個曾經體驗過的瞬間。如果沒有思考，那麼除了突然的開始，便什麼也沒有了(——它往往是震驚的感覺，據Freud看，這證明了防範震驚的失敗)(張旭東、王斑譯，1998)。

16. 在關於歌德的**親和力**的論文中，Benjamin(王炳鈞、楊勁譯，1999)將「經驗」與「震撼經歷」做出區分：短暫性和可重複性是複製品特有的，而一次性和持續性則僅屬於原作，與「經歷」(Erlebnis)不同，「經驗」(Erfahrung)正是以一次性和唯一性為特徵，……正如「經歷」對立於「經驗」概念，「震撼」對立於「靈光」(aura)。

斑譯，1998），也曾經具體比較繪畫與電影：「……觀賞者很難對電影畫面進行思索，當他意欲進行這種思索時，銀幕畫面就已變了。電影銀幕的畫面既不能像一幅畫那樣，也不能像有些現實事物那樣被固定住。觀照這些畫面的人所要進行的聯想活動，立即被這些畫面的變動打亂了，基於此，就產生了電影的驚顫效果……」（吳松江、張文定譯，1991）。但事實上，Benjamin所真正關切的是，在經驗受如此威脅的情況下，如何重新贏得經驗的「本真性」，只可惜，Benjamin的一生被他貶抑地標記為「靈光的衰落」，在靈光的衰落中，體現出一件物體的一次性的消散，其真實性的瓦解，使其成為原作的東西的崩潰。於是，Lash的「資訊批判」中，某種程度上，透露出對Benjamin的認同，與因此而來對傳統、「本真性」與「靈光」消逝的緬懷。

三、「震撼經驗」的資訊批判

在「電子時期」的傳播社會中，Lash認為，我們閱讀報紙、觀看電視、瀏覽網際網路，是在不經意的分心狀態下進行，弔詭的是，深度參與正是發生在不經意的分心狀態下，……電子文化的不經意接收，卻同時是沈浸其中的，……我們在客廳裡消費電視；藉著生活在建築物與都市裡，來接收它們，都是一種不經意的沈浸（Benjamin, 1974; Lash, 2002, p. 184）。於是，電子媒體立即、不斷地創造出一個完全互動的事件場域，所有人都參與其中，有一種「僅此一次的立即性」存在，……你並非解讀符碼，而是在感覺它們，……而這個驅力的場域、這個僅此一次的拼貼被一再地重複，總是以新的姿態出現，但卻重複；總是短暫、無用的、成為昨天的報紙，但也總還是會有今天的報紙、今天的重要比賽、下一個明日之星、今夏的賣座電影（Lash, 2002, p. 185）。

Lash想強調的是，傳統媒體的「再現」（representation）本身是一種反思的（reflective）過程，需要花時間；但新媒介的「呈現」（presentation），在時間與經費的限制下較為機械性，……新媒體主動到你面前來，這些新媒體是機械性的，它們要不透過傳輸機器傳送，要不，就是透過資訊機器直接傳佈，總之，產製、傳佈與接收，不是真實的機械，就是隱喻性的機械（Silverstone & Hirsch, 1992; Lash, 2002, p. 71），資訊媒介跨越遠距、即時運作，沒有留半點時間給意義豐富的媒介，新媒體「呈現」運作，沒有詮釋，甚至沒有意識型態，是純粹的資訊形式、資訊的單元、時效性的訊息。於是，過去，理論本身必須透過「論述」運作，但「媒介理論」改變了這件事，它們是遠距的，從生活的持續形式中抽離出來，被立即產製、接收，完全沒有反思的時間，當然也

是「非論述」的。

至此，Lash所謂「震撼經驗的資訊批判」最簡化的輪廓，可以大致描繪成：在「本真性」與「靈光」消逝的機械複製時代，面對傳播技術大量生產所「呈現」的媒介，即時、短暫、神經性刺激迅速湧入人腦，因為沒有足夠的時間和距離，根本無法反思，資訊批判的「思考」是一種瞬間的「震撼經驗」，類似潛意識的反射行為，批判理論當然也無法以線性的論述來呈現。

正因為Benjamin的作品明顯對「商品消費」以及「技術處於統治地位」有所批判，且批判透過「震撼經驗」運作（Caygill, 1998; Lash, 2002, p. 219），Lash極度肯定Benjamin是個批判理論家，提供我們「資訊批判」理論，尤其，這個資訊批判並沒有替「意義」留下空間，而是透過「思考」（潛意識的）、「操作性」（不具意義）來理解。

一般對Benjamin的理解，認為他堅決背離意識哲學以至於意識批判的內在模式「意識型態批判」，因為這條道路對他來說不再是一條可行的路線¹⁷。因此，Lash將理性批判也推得如此之遠，突顯出對Benjamin的認同，他寫到：對Benjamin而言，當代的时间已經消弭至科技與「震撼經驗」的內在空間之中，Benjamin的批判理論仍舊維持了一種辯證的唯物論觀點。在辯證唯物論中，科技的經驗世界、震撼經驗以及速度，將存有與理性劃分到荒蕪之地（wasteland），其中的先驗時刻（transcendental moment）則被保留為記憶與悼辭（Lash, 2002, p. ix）。

Benjamin在柏林記事中形容自己的寫作，只涉及空間、瞬息和非連續性（潘小松譯，2001），經常觸及的主題是如何對世界加以空間化，所謂「將思維空間化」的例子之一，就是把思想和經驗當作廢墟。Benjamin的觀點是，歷史的事實不在於暫時的斷裂而在於永恆的斷裂，它所留下的是一堆廢墟，我們再也無法把這堆廢墟縫合起來，但我們也不能在這廢墟前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只能認真的去研究它。因為，在這堆廢墟中可以看到「本真性」，看到唯一的一次形成自己思想的機會，促使我們應對當下所面對的危險。

因此，Lash認為，我們生活在一個「經驗社會」，一個充滿「震撼經驗」的社會裡，並非意味著，我們生活在一個不理性的社會，或現在的社會比以前還不具思想，批判是可能的，批判可以透過「思考」獲

17. Benjamin在早期一篇「論感知」的文章中，批評Kant用認識論的經驗概念取代直接的經驗概念，指出「經驗本身在認識經驗的過程中是不可能出現的」，對於Kant把認識論的經驗和直接的經驗混為一談，Benjamin嚴格區分了經驗和對經驗的認識（王炳鈞、楊勁譯，1999）。

得。顯然，Lash也試圖將「思維空間化」，一如Benjamin的廢墟，以便在媒介空間的廢墟中，看到唯一的一次形成自己思想的「本真性」，以因應面臨的「危機」。

Lash藉由Benjamin (1892-1940)的「震撼」、「經驗」與「靈光」作為發展「資訊批判」的線索，其中容或埋藏些許對傳統的緬懷，但Lash的重點應該不在迷戀、收藏廢墟，同樣的，批判者也並非廢棄物的保管員，或骨董鑑定、收藏家。從另個角度來看，Lash的作法倘若也是將洞察力與奇幻怪誕的理論聯繫起來¹⁸，對於傳播領域研究而言，這種「陌生化」的過程，將那些在傳播社會中原本不言自明的、司空見慣的現象及其相對應的理論與方法，改換一種傳播學者較陌生的態度來面對，未嘗不是「不預期」的驚奇可能浮現的途徑。

伍、匯流時代的媒介批判理論與實踐

理論本身正如運動與其他媒介實踐，在電子時代裡，可能不過是一個補充物，一個添加進場域裡的東西，一個其他地方的連續。理論不再是「再現」的，也不再佔據另一個批判的本體論層次；理論僅能被填補，作為一個補充物，添加於內在集合的全球網絡中，然而，這種添加物可以造成整個集合體的重新構造 (Lash, 2002, p. 181)。

Lash所謂，經驗知覺、無法反思、非論述、潛意識、瞬間反射「震撼經驗」的資訊批判，確有其參考價值以及嘗試操作的可能，然而，接下來，若試圖落實其媒介批判，則還涉及方法的問題。

一、藉由現象學挑戰實證二元論

Lash的資訊批判明顯反對「再現文化」的實證主義，且試圖打破實證「主-客」二元的思考模式，而由於現象學始祖Husserl的意向性 (intentionality)，採取一種「本質直觀」，以「先驗還原」揭露物自身 (things-in-themselves) 本體論架構，因此，Lash藉用現象學的立論，提出對實證二元論的挑戰，只是，Lash據此立足，卻仍批判Husserl、Heidegger、Levinas與Derrida等人，認為Heidegger、Husserl的現象學是「先驗」的，Levinas和Derrida也都沒有落實「互為主體性」¹⁹。

18. Benjamin的好友Schlom曾經指出，Benjamin最令人驚異的特質之一，在於他傾向把洞察力與奇幻怪誕的理論聯繫起來。

19. Lash認為，Husserl的研究是先驗的，而Derrida不僅將「我-它」(I-It)的關係置於「我-你(或互為主體性)」(“I-Thou” or intersubjective)之上，還經常試圖

Lash如此針對性的批判，並不難理解，因為他所強調資訊化社會的「技術文化」，必須透過「去除先驗」運作，經驗主義才是處理資訊批判的中心要旨，從這個角度來看，現象學者中，Lash認為，Schutz與Garfinkel拋棄反思態度以及先驗還原，……同時也拋棄認識論與本體論，尋求徹底的經驗主義，提供的是一種徹底經驗的現象學。尤其Garfinkel，對世界的理解沒有先驗主體，而是透過許多外在參與生活方式成員的經驗溝通所發生，因此，Lash相信Garfinkel的現象學，創造打破先驗性的態度與本體論，是一種自然態度（nature attitude）、徹底經驗的現象學，一種「內在性」現象學、資訊時代的現象學（Lash, 2002, pp. 167-168）。

Garfinkel被Lash認為是絕對的反實證主義者（anti-positivist），稱之為一種傳播的現象學、技術的現象學，當然，他的現象學也被Lash視為一種對「先驗」現象學假設的批判（Lash, 2002, pp. 156-157），並以此為基礎，思考「自反性」（reflexivity）如何在「技術文化」中轉換²⁰。在這個意義下的現象學，經驗取代判斷，經驗者被賦予「意向性」，與被經驗者處於同一個世界之中（經驗者並非站在制高點上），全球資訊社會以及非線性文明秩序的伴隨，所連接的不是一個「再現文化」，而是一個「技術文化」（Lash, 2002, pp. 163-164），結果，「技術文化」、全球資訊社會秩序，基本上都是現象學的。而Garfinkel的「俗民方法學」，在Lash的認知裡，也是技術。

雖然，Lash的「資訊批判」是否全然「去除先驗」、摒棄「主客二元」的思考態度及框架，還有待檢驗（因為資訊批判一書中，並未提及任何經驗研究可供判斷），不過，他至少探討Garfinkel如何將先驗現象學轉換為一種經驗主義的傳播現象學，以「表象直觀」取代Husserl的「本質直觀」（Lash, 2002, p. 174），以「經驗還原」取代「先驗還原」，提供不少重要線索。接下來的問題是，Garfinkel的「俗民方法

將「反思態度」置於「自然態度」之上。至於Levinas提出一種在自然態度中有效的「互為主體性」，但Lash也認為，不像Schutz或Gadamer「互為主體性」那種認識、理解或承認「他者」，因此斷言Levinas想要一種「Heidegger式」本體論的「本質直觀」（intuit the essence），但事實上，Heidegger是個技術的、「我一它」的哲學家，「他者」在Heidegger的存在分析中扮演很小的角色，支配的是「我一它」的關係，而不是「我一你」（Lash, 2002, pp. 93-113）。

20. 「自反性」不再是關於遙遠的決策制定（decision-making）或生命敘事（life-narrative）的組織（Beck et al., 1994; Lash, 2002, p. 156），而是關於「自反性」的嘗試將知識運用於行動，以致知識與行動之間不再有距離。如今，行動即知識，知識即行動，社會知識變成了內在於技術文化之中。

學」在適用上是否確有其「優位性」？

二、俗民方法學 (Ethnomethodology)

Garfinkel所創的「俗民方法學」(Ethnomethodology)受現象學影響，把行動者看作社會的主動創造者，以微觀的角度專注於日常生活研究，關切思想與行動。但因為，現象學集中在思想論述；俗民方法學強調經驗實證研究，現象學關切意識與文化，行動者較受約束限制；而俗民方法學則專注於行動和互動，強調行動者的自由，被形容為「無法化約還原回現象學」的論述(陳迪暉, 2001)。這或許正是Lash之所以藉由現象學的立論，提出對實證二元論的挑戰，卻批判Husserl等人的現象學是先驗的，沒有落實「互為主體性」，而獨鐘Garfinkel的所在²¹。

所謂的「俗民」(Ethno)是指，在其社會中擁有常識的成員，而他所處的社會是一個透過常識可以理解的地方，如果他是一個對植物有興趣的俗民，那麼，他的知識必須足以應付成員們在植物環境上的需要。一個來自其他社會的人，例如一個人類學家，他會請這位俗民進入與他具備同樣常識的成員群體，形成推論與行動的合適基礎，引導他處理自己的事物(Turner, 1974)。

事實上，俗民方法學研究最重要的任務在於：定義日常生活的常識世界、顯示日常生活行為與社會學理論的關聯性、探索常識世界對人們重大的意義。於是，研究者並不嘗試解釋日常生活行為的意義，而是為了解世界才透過人們做出說明解釋(account)，以找出其中的規則或密碼(Garfinkel, 1967)。更具體的說，Garfinkel的「俗民方法學」聚焦於人們在社會中的「常識性知識」，專注於日常生活，人們與其他相類似的人在群體中所採取的行動，研究人們推論的合適基礎(adequate grounds of inference)，原則上，關注人們對事物的理解，但不對行為提出解釋，而是從人們自然而然做事的方法中(特別是對話與所做的事)，尋找行動的意義(Berger, 2000)。這也是Lash之所以說，Garfinkel的俗民方法是所謂「自然的態度」或「日常生活的態度」，對照科學態度和反思態度，是「做」的方法，和「知道」的方法(Lash, 2002, p. 167)。

21. Garfinkel的「俗民方法學」關鍵在於它同意Husserl的現象學，卻不以先驗的方法來思索，因此，被理解為主要不是闡明「實行」(doing)，反而是關於「思考」(thinking)，在於闡明知識。於是，俗民方法學並非實現日常生活形式的社會實踐的「方法」，而是知識、認識的方法(Lash, 2002, p. 167)。不過，Lash(2002, p. 168)強調，其目標並非如俗民方法學之成員的知識，而是試圖擷取一個徹底內在的以及經驗主義式的現象學，致力為全球資訊秩序發展一個「感官的現象學」(phenomenology of sensation)：一個立即又遠距的現象學。

而對於說明過程的自反性 (reflexivity) 或具體化 (incarnate) 特質，正是俗民方法學研究的要點。

在Garfinkel經驗主義式的現象學中，思想或知識 (理論、方法) 並非「反思的」而是「自反性的」。它並不具有反思的距離，而是「具體化」於活動及表達之中，是一個持續不斷給予說明的活動、表達與事件的實踐，並傳達給既定秩序中的成員。「反思」在持續活動的暫停時間中發生，但在Garfinkel的現象學以及技術文化中，並不存在任何的暫停時間 (Boden, 1994; Lash, 2002, pp. 174-175) 。

在方法上，俗民方法學試圖發展一種新的社會學研究方法，基本技術是干擾或打亂社會生活例行的方式，因為，Garfinkel的學生們從許多實驗個案中發現，人們對事物共通的理解與背後的期望極為頑固，一旦不預期的事發生，就會形成問題與困難。因此，「製造混亂、驚駭、困惑，而造成焦慮、恥辱、內疚、憤慨的社會組織影響，進而完成混亂的互動」(Berger, 2000) 後，比較被干擾前後所發生的現象，往往可以發現人與人之間重要且有趣的事。

事實上，「俗民方法學」和Goffman的「戲劇理論」都屬「象徵互動論」的分支，也都強調人們的詮釋過程²²，但相較之下，俗民方法學留給行動者較大的自由空間，而Goffman論述下的個人行動，只是主動地將其參考架構投射到周遭的世界，致使其在對人的自主性、詮釋性以及創造性的論述上，都不及俗民方法學，這應該也是Lash在方法的取徑上，之所以相信Garfinkel有著力之處的原因，同時，有助於「落到生活世界」媒介理論的建立，但目的又並非建立一個概括性的理論。

對於俗民方法學如何應用於傳播研究，Berger (2000) 認為，由於這是一種破解人們說話方式與日常行為背後所隱藏的符碼以及潛在意識信仰系統，因此建議，可用來分析媒體文本中對話 (甚至歌詞、笑話等)，就像分析日常生活會話一樣。此外，還可運用在檢驗次文化 (例如藥物濫用、妓女、犯罪)、分析與傳播有關的運動 (女性主義運動、同性戀解放運動)，以及組織中的傳播等。因此，理論上，將俗民方法學運用在傳播領域中作為分析的技術，是毫無疑問的，只是，應用在Lash所謂「技術文化」的媒介社會中，是否真有其「優位性」，還需要累積更多經驗性研究才具說服力。

22. 對俗民方法學而言，人們對日常生活的詮釋是創造性的，透過不斷的說明過程來建構其生活世界，但對Goffman來說，人們的詮釋過程是在既定的社會情境下所做出的詮釋，正確的評估情境，然後跟著去行動，所以Goffman (1974) 認為，情境定義並不是由情境中的人去創造的。

尤其，不少關於俗民方法學的「刻板印象」，使得學術研究者在方法的採行上有所遲疑，例如，「沒有人能夠確定俗民方法學究竟是什麼」的說法，雖然太過誇張，但俗民方法學研究的確是最令人傷腦筋的一種研究方法，除了它似乎拒絕簡單的定義之外，研究範疇雖然有趣，但似乎也總是微不足道（Berger, 2000）等等，這些都是Lash之所以不能只在方法上作理論性的分析，而必須更具體實踐的原因所在。

三、附加、補充的「媒介理論」（mediatheory）²³

「社會再製」與「社會作為一個有機體」是社會學的重要概念，但在資訊批判中，Lash身為一個社會學者，卻強調流動的理論、傳播的理論與媒介學理論對這本書才是一大貢獻（Lash, 2002, p. 209）。「傳播」成了關鍵的辭彙，對全球資訊秩序而言是主要的社會事實，最後統整到「傳播」邏輯中，成為「媒介理論」（media theory）。事實上，Lash企圖探索的，並非媒介的社會理論，也非媒介的文化理論，正是媒介理論（media theory），也就是，不僅社會和理論，透過大眾媒體的運作，就連文化也成為資訊的一環，不是敘事、論述或再現，在某些重要的面向上，都變得更資訊化，而這種資訊化模式正是藉由大眾媒介本身建立起來的（Lash, 2002, p. 66）。Lash說，「媒介理論」在它的構成上，可能是一個矛盾的辭彙，但也可能同時是我們處於全球資訊秩序中的宿命（Lash, 2002, p. 77）。

Lash（2002, p. 65）自問：倘若批判可以不再是先驗的，必須內在於資訊秩序之中，資訊批判會逐漸變成媒介理論，然而，當批判與反思都走到衰退終點時，「媒介理論」會是什麼？Lash雖然僅提供抽象的論述，仍有「深耕」的空間，不過，其「思考路徑」對於傳播領域理論的發展與積累，提供了頗具啟發性的線索。

Lash關於「媒介理論」的思考，很大一部份來自McLuhan「媒介是人的延伸」，並進一步詮釋「技術是人的延伸」。因此，如果說，Garfinkel的現象學，強調主體與客體在同一世界，那麼，McLuhan，便是將主體與技術融合，在內在性的「技術文化」中，主體與客體在本體論的地位上「匯流」融合（Lash, 2002, p. 177）。事實上，在稍早的年代裡，媒介主要是「再現」的，我們要不是透過宰制的關係，就是透過反抗的關係與媒體相連結，而現在，一旦媒介變成了「人類的延伸」，就不再主要是人類的「再現者」，作為人類的延伸，媒介就成為技術（Lash,

23. 許多北歐的電子期刊幾乎都將media theory兩個字結合在一起，視為一個字「媒介理論」（mediatheory）（Lash, 2002, p. 66）。

2002, p. 176) , 技術變成某些已經完全進入我們的生活形式裡的東西。

Lash相信,千禧年開始,是「新媒介」的發展期,媒介理論可以被視為取代了社會與文化理論,但媒介理論既非對媒介的解釋也非詮釋,媒介理論是探索存在於解釋與詮釋之間的二元對立;媒介理論代表了媒體,而不僅僅代表解釋或詮釋(Lash, 2002, p. 76),第三個千禧年,批判將成為Haraway所說的「謹慎的見證者」(modest witness)²⁴(Lash, 2002, p. xii),與中立的、放肆的純粹科學判斷有所不同,見證者足以見證事實,也能見證權力,他能見證那些被註冊上商標、被專利化,以及被當成資本積累的資訊,也能見證資訊本身得以運作權力的形態:讓某些人得以接近,某些人不能接近。在資訊的資本主義裡,事實就是那些商標,那些可以被標價的事物(Lash, 2002, p. 192)。

Lash(2002, p. 65)主張:媒介理論是一種用來思考當今全球資訊社會的典範形式,媒介提供了一種模式,能夠為今日世界裡的資訊建立一種典範,就這個意義而言,資訊社會更確切地說,應該被貼上「媒介社會」(media society)的標籤。Lash(2002, p. 68)認為,在「二元」的時代中,「媒介理論」不可能,而當媒介社會興起後,推翻二元對比(工具性和目的性間的差異),將原先的「先驗性」變成了一般的「內在性」,使得資訊和傳播既不是工具性也不是目的性:資訊和傳播建立網絡,形成連結,便是一個媒介社會,成為全球資訊社會全新的「第三本質」。至於Lash之所以指出電子化時期的媒介,不是情境的「再現」,而是情境的延伸、「附加」(additivity),當情境延伸到其他場所時,媒介變成了「填補物」,思維上其實是來自McLuhan與Haraway提示的影響。

對McLuhan而言,當感官、科技與其他事物產生連結,並達到相適與平衡時,附加、「和」(and)、補充物就是事物的秩序(Lash, 2002, p. 181)。McLuhan將「線性」和「附加」做相對的理解,強調「附加」與「連接」的優先性,電子化時期是「和」(and)的社會(Van Toorn, 1998; Lash, 2002, p. 180),標示著從「因果」、「再現」轉變為「附加」。於是,電視新聞不再是政治的再現,而是其他地方政治的延伸;文化不是在再現的「文本」裡出現,而是在現象的場域裡出現。

同樣的,Haraway「見證者」的角色,也並非在於「再現」知識,而是去「接合起過程、客體與形態標誌的各個部份」,也就是說,透過

24. 也就是說,當知識並非以預測性的判斷形式出現時,……人們對於所作所為提出說明,產生意義,並對所作所為的後果足以負起責任,作為一個見證者,截然不同於中立、放肆的純粹科學判斷。

這個接合來修正界線。為「謹慎的見證者」，接合與連接起科技科學的資訊秩序，並非為了造成一個批判性的空間，而是達成一種闡述，資訊的批判只是一個「補充物」。我們所佔據的，並非一個分離的本體實質的批判空間，而是補充的、由另一個接合所連結起的空間，一個更傾向於「和」（and）的空間，更接近於與全球科技科學的資訊網絡相結合的空間，與其他實驗室、工作室、網站相連結（Lash, 2002, p. 192）。到最後，平台與標準規格成為進入「生活技術形式」的條件；……無法接近平台，就意味著被排除在全球資訊秩序之外（Lash, 2002, p. 198）。

「生活的技術形式」透過資訊而得，資訊的批判存在「和」（and）的權力裡，存在重新構成界線，與重新辨認客體的補充物中的權力裡。我們可以重新辨認它的客體並挑戰它的界線；論爭這些客體是否能成為財產，倘若可以，又是屬於誰的財產，以什麼形式出現，批判必須是內在於資訊之中，在它之外並沒有任何的空間存在（Lash, 2002, p. 201）。唐士哲（2003）理解認為，Lash揚棄「批判行動對立於批判主體」的思考模式，採取一個以「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為出發點的批判路徑。貫穿全書的主題，是社會形式的溝通／傳播化，以及批判的社會實踐，在面對媒介社會裡科技化的生活形式，「呈現」（presentation）為主，應如何與其共存而非與其作對。

陸、總結

在全球資訊社會中，Lash認為，資訊文化從過去的「再現文化」逐漸轉換成一種「技術文化」，是一種「遊戲」關係，主體與其他主體或客體之間對話性、互動性地相互聯繫，社會結構被「流動」、資訊與傳播結構所取代，社會關係轉型為傳播關係，而在批判包含的三個面向（內容、符碼與傳播）中，傳播也是其中最重要的元素。面對如此一個電腦、網路傳播等形成優勢地位的時代，社會與文化生活都被媒介滲透，我們所需要的不是社會理論也不是文化理論，正是「媒介理論」，且很可能就此取代社會與文化理論。

其實，Lash傾向於將「資訊時代」理解為「媒介時代」，或者更具體的說，我們生活在一個「傳播社會」之中。只是，社會中生產出高度知識性與理性的同時，卻也導致了最極端的（也是最具資訊性的）非理性的滲透與下載（Lash, 2002, p. 75）。因此，Lash提醒，當前亟欲處理、面對的是「解資訊的資訊社會」（disinformed information society），Lash指的是一種，當即時資訊充斥、快速、極度壓縮、不具資

訊告知功能，理性與非理性並置、不預期結果的傳播社會。

也正因為傳播社會具有如此的特徵，Lash肯定Benjamin提供了「資訊批判」理論，並將「震撼經驗」、「觀念藝術」與他的「資訊批判」接合起來。正如Benjamin在「作為生產者的作家」中指出，藝術的生產絕不只是生產者一方就能夠完成的，因此，媒體創造的虛擬環境，並不僅僅是生產者和媒體運作的結果，受眾也是這一環境的重要組成部分（劉北成，1998，頁176），而在「暴力批判」中更強調，作品誕生後，意義是不完整的，殘缺的部分必須由受眾去完成（陳永國、馬海良編，1999，頁14），接受者（讀者、觀眾、聽眾等）不僅僅是從前意義上的消費者，而成了藝術生產積極的參與者（陳永國、馬海良編，1999，頁28）。於是，當「機械複製時代」來臨時，資訊文化類似觀念藝術作品，不完整、甚至未完成，但卻沒有足夠的時間給予意義，也沒有空間反思，使用者的媒介行為變成一種「潛意識」對「震驚」的反射，外在沒有了完美的判斷標準，批判也只是一種「補充」與「附加」。

至於，操作批判的問題，或許Koolhaas（2000; Lash, 2002, p. 219）多年來研究奈及利亞最大城市Lagos的經驗，是Lash認為最好的例子之一。Lagos是一個「去組織化」的都市，貧窮、機能障礙、腐化墮落，一片混亂失序的城市，倘若以一種「先驗」的意識、「完美」的標準來觀察，自然無法理解其運作的可能性？但Koolhaas與他的學生不斷在尋找某些不一樣的東西，他們拍下Lagos許多空間裡的事物、汽車與人們移動的照片，……不斷尋找資訊市場：電子與微電子設備如何在資訊工作單位裡被修復，被重新程式化以及重新流通。都市本身在「流動」的年代中，也需要重新思考，它不給意義，只是運作，是「操作性」的（Lash, 2002, p. 219），因此，進行批判當然也必須立足其內在，一個批判者若能摒除既有的先驗判斷，完全進入Lagos，便能理解並發現，何以如此的城市，竟還能運作。而當批判對象轉換成數位匯流的傳播社會時，邏輯是相同的。

唐士哲（2003）評論指出，傳統的傳播理論，向來漠視失序的溝通／傳播環境的「常態性」，而對於不同媒介形式所塑造的傳播／溝通情境以及意義建構，也常是模糊以對。面對現實生活中紊亂的資訊環境及有能力「創造現實」的媒體，理論的態度常是道德的撻伐聲多於摒棄成見的探求。顯然，某種程度上，也認肯Lash在理論上「另類」思考的貢獻。然而，由於Lash與McLuhan大量的對話，論述處處可見McLuhan的思想痕跡，這也使得Lash不免招致批評：以後現代社會學的觀點建構的媒介理論，強調資訊「溝而不通」或「只求溝通、不問內容」的特質

（唐士哲，2003），難免被貼上「技術決定論者」的標籤。不過，從Lash大篇幅強調McLuhan本人反對「線性因」以及任何因此而來的決定論看來²⁵，表面上似乎是替McLuhan辯解，但實質上也為自己解套。

1964年，McLuhan出版**理解媒介**（*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提出「媒介即訊息」（medium is the message）的論述，其實是認為，人們太過注意媒體的內容，忽略了媒體本身對人的影響，這其中，Lash真正關注的重點應該是在於，倘若媒介是人的延伸；媒介的延伸，改變了人的感官，也改變了人類看社會的方式，更進而觸發社會組織的改變（宋偉航譯，2000）。事實上，Levinson即便不滿McLuhan把重點放在科技上，矮化人類控制的力量，但也承認「媒介決定論」的封號可能不是很恰當（宋偉航譯，2000），用句翟本瑞所說的話：「McLuhan用一種未來風格，述說時代的轉變，只是大家都還採用『後視鏡』²⁶來評斷其學術價值，沒有認識到學術風格終將依媒介改變而有所變遷」（翟本瑞，2001）。

其實，Dwight McDonald也曾批評McLuhan：「將文化劫掠一空，從洞穴壁畫搶到**狂人雜誌**，亂搶些斷簡殘篇，只為了支持他理論體系的『廢墟』」（宋偉航譯，2000）。試想，如果Benjamin是個廢墟遺跡的收集者，Lash借用Benjamin的理論指出，廢墟遺跡只是原有的使用價值消失，但可以回收到博物館，轉換成為「好的事物」甚至「商品」，那麼，對Lash而言，McLuhan的理論體系當然也具有「回收利用」的價值。

至於，Lash更獨鍾「古老」的Benjamin，事實上，在數位匯流的傳播社會中，我們愈發認識到Benjamin從技術角度批判大眾文化獨到的理解²⁷，因為，在一片批評科技帶來工具理性擴張、人文理性縮減的年代

25. Lash指出，當McLuhan說，技術、媒介成為中樞神經系統的延伸，「線性因」便被摒棄，回到非線性、不連續的邏輯下，尤其McLuhan認為，人類主要並非技藝人（homo technologicus），而是傳播人（homo communicans），科技只有在人類進行傳播時，才是人類的延伸（Lash, 2002, p. 178）。Lash（2002, p. 182）甚至猜測，McLuhan可能會主張：所有的古騰堡時期的媒體，如今都在資訊化「馬賽克／拼貼」（mosaic）霸權的主宰下出現。

26. McLuhan所謂「後視鏡」（rear-view mirror）的論點是說，「我們總是透過後視鏡來看現在的一切，我們是倒著走向未來的……」，他提醒的是，隨時隨地注意我們認知上的錯誤，注意路上的坑洞不要掉了進去，也可以解讀為：所有新的媒體都是透過舊有的媒體特性演化而來的；如能對舊有媒體的特性加以掌握，將有助於我們面對新的媒體（翟本瑞，2001）。

27. 在Benjamin時代，攝影、電影、電報、電話、廣播等媒體形式漸趨成熟，當英國1936年播出電視節目，標示著電視技術的初步成型時，Benjamin在**社會研究雜誌**上發表著名的「複製技術時代的藝術作品」，以攝影和電影為例批判大眾媒體。

中，Benjamin便指出了「社會現實並沒有準備把技術變成自己的器官，而技術也沒有強大到足以控制社會的原始力量」（劉北成，1998，頁160）。

Lash在**資訊批判**中，借用許多概念名詞重塑「新秩序」，反覆處理「流動」、「失序」、「去除先驗」、「內在性」、「操作性」、「附加」、「補充」、「連接」、「和」……等關鍵字，以一種「非線性」，甚至「放射狀」的風格，勾畫出傳播科技匯流社會的新秩序與權力輪廓。本文從Lash所論述的資訊、技術、權力新秩序、自反性、生活型式、媒介社會、媒介理論以及方法論，分析「其然」及「其所以然」，檢視所謂「資訊批判」究竟所指為何，理論及方法的運用是否足以支撐等等，結果，可以初步說，「資訊批判」有其可能性，但在「實踐」面上，還需要更多經驗證據「補充」。

面對媒體、電腦及電信傳播匯流的時代，Lash的**資訊批判**以非傳播領域的學說論述進行「跨學門」對話，觀察到傳播「視角」較陌生的部分，強調「技術客體」本質的「自反性」，使得傳播科技本身的「成就」，很可能正是造成媒介社會失序「不預期結果」的原因，因此，媒介批判必須從傳統對「再現」文本注意力的認識論移轉到「技術現象學」，因為，不再有「先驗」的理論，或「完美」的外在判斷標準，批判透過「震撼經驗」而來，媒介批判與批判者扮演的只是「填補」的角色，以一種「附加」、「補充」、「操作」的過程，使傳播社會藉此得以修復，或更趨「完整性」。

雖然，批判理論是否真的「行不通」，Lash的論點還有待檢驗，但他跳脫「資訊社會」舊有地標、描繪出一個動態「傳播社會」的地景及秩序，是很清晰的，同時，所謂「內在於資訊本身之中」的「資訊批判」，也確有其可能性，只是衡量其理論與方法上的思考及解決，是否真有助於傳播領域學門知識在數位匯流時代中向前推進，顯然，**資訊批判**還不能算是「完成品」，Lash需要更具體「實踐」其「基進的傳播現象學」累積「媒介理論」操作批判，才得以「填補」完成。

參考文獻

- Beck U., Giddens A. & Lash S. (2001)。自反性現代化——現代社會秩序中的政治、傳統與美學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Politics, tradition and aesthetics in the modern social order*) (趙文書譯)。北京：商務印書館。(原作1997出版)

- Benjamin W. (1998)。啟迪：本雅明文選 (*Illuminations: Essays and reflections*) (張旭東、王斑譯)。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原作1955出版)
- (2001)。莫斯科日記/柏林紀事 (*Moscow diary a berlin chronicle*) (潘小松譯)。北京：東方出版社。
- Levinson P. (2000)。數位麥克魯漢 (*Digital McLuhan: A Guide to the information*) (宋偉航譯)。臺北市：貓頭鷹。(原作1999出版)
- Williams, R. (1991)。文化與社會 (*Culture and society*) (吳松江、張文定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原作1958出版)
- 王炳鈞、楊勁譯 (1999)。經驗與貧乏。天津：百花文藝出版。
- 包亞明 (2003)。都市與文化 (第2輯)——現代性與空間的生產。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李雙志譯(2004)。經驗的破碎(1)——瓦爾特·本雅明：作品、生活、時代和歷史的交疊。現代哲學，4，28-37。
- (2005)。經驗的破碎(2)——瓦爾特·本雅明：作品、生活、時代和歷史的交疊。現代哲學，1，24-33。
- 唐士哲 (2003)。媒介社會的批判實踐：評介Scott Lash的資訊批判。新聞學研究，75，247-251。
- 陳永國、馬海良編 (1999)。本雅明文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陳迪輝 (2001)。俗民方法論、結構功能論、符號互動論與現象社會學論述立場之分野。南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電子期刊，16。檢自：<http://mail.nhu.edu.tw/~society/e-j/16/16-3.htm>
- 葉啟政 (1996)。對資訊社會來臨的一些思考。第一屆資訊科技與社會轉型研討會論文。臺北：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
- 劉北成 (1998)。本雅明思想肖像。上海：民眾出版社。
- 翟本瑞 (2001)。網路文化。臺北：揚智。
- Beck, U. (1992).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Berger, A. A. (2000).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method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Boden, D. (1994). *The Business of talk*. Cambridge: Polity.
- Caygill, H. (1998). *Walter Benjamin: The Colour of experience*. London: Routledge.
- Debray, R. (2000). *Transmitting cul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Donald Nicholson-Smith (1991).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H. Lefebvre, tran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74).
- Foster, H. (1996). *The Return of the real*.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Garfinkel, H. (1967). *Studies in ethnomethodology*.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 Goffman, E. (1974). *Frame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Kant, I. (1952). *The Critique of judgement*. Oxford: Clarendon.
- Lash, S. & Urry J. (1994). *Economies of signs and space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Lash, S. (2002). *Critique of information*.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Luke, T. (1995). *Global modernities* (M. Featherstone, S. Lash and R. Robertson, Ed.) London: Sage.
- Lury, C. (1993). *Cultural rights*. London: Routledge.
- McLuhan M. (1964).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 London : Routledge.
- McLuhan M. (1962). *The Gutenberg galaxy : The Making of typographic man*.
from <http://mail.nhu.edu.tw/~society/e-j/29/29-24.htm>
- McLuhan M. , Fiore Q. (1976). *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 An Inventory of effects*. San Francisco, CA: HardWired.
- Poster, M. (1990). *The Mode of information*. Cambridge: Polity.
- Schramm W. (1973). *Men, messages, and media: A Look at human communication*. New York: Harper & Row.
- Silverstone, R. and Hirsch, E. (1992). *Consuming technologies*. London: Routledge.
- Turner, R. (ed) (1974). *Ethnomethodology: Selected readings*. Baltimore, MD: Penguin.